

壮游

← (上接7版)

解释呢?既然他这么问,当然他会有自己的答案。

玻利尼西亚群岛的古代岛民有点像逐水草迁徙的游牧人,他们在一个岛上生活一些世代,资源消耗得差不多了,就乘船离开,寻找新的岛屿,这种生存模式是玻利尼西亚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相对隔绝的复活节岛(拉帕努伊),迁往其他岛屿的可能性太低。经过初期的经济繁荣和人口增长(拉普说,到16世纪曾多达2万人,当然这在学者中仍是一个争议话题),森林砍伐净尽,造船的原料没有了,远航的希望也断绝了,人们困陷在岛上。资源越来越少,食物越来越少,富余劳动力却越来越多。当劳动力成本越来越低,投入摩艾石像制作的人力越来越多,石像尺寸也会越来越大。

话锋一转,又回到中国。拉普问我们:那么在今天的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是资源有限同时却拥有数量巨大的过剩劳动力呢?中国,大家回答。“是呀,”他说,“中国人也可以制作越来越大的摩艾,中国的摩艾是 Made in China, 现在中国制造在世界上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我作为中国人的一个远亲,感到很骄傲呀。”

说到复活节岛的历史起点,拉普根据玻利尼西亚群岛的文化传统,指出古代玻利尼西亚人迁徙到没有河流(意思是没有稳定淡水供应)的小岛时,通常不急于登陆,而是环岛航行,依据岸边海水的含盐度决定登陆地点,水不那么咸的地方,说明那里靠岸处有较多地下水,就可以挖井取水。最早来到复活节岛的人们,大概也是这样做的。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呢?学术界有很多争论,有很多种假说。“我同意威廉·穆洛伊的意见,”拉普说,“应该是在4—5世纪。穆洛伊在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发掘出一个7世纪的摩艾。7世纪就有足够的人力制作摩艾,那么之前大概需要两个世纪来使最早登岛的那一小群人增殖人口,所以他推测是4—5世纪。”

有研究者,如在复活节岛研究史上十分重要的挪威考古学家托尔·海尔达尔(Thor Heyerdahl),提出玻利尼西亚人并不是最早来到复活节岛的人,或者说,玻利尼西亚群岛并不是复活节岛早期居民的唯一来源,南美大陆提供了另一个来源。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复活节岛上很早就有原产于南美的甘薯(红薯)。提出这个假说的托尔·海尔达尔进一步解释说,甘薯就是经由复活节岛向玻利

尼西亚群岛和其他太平洋岛屿传播的。“99%的研究者不同意这个说法,我也不同意,因为南美印第安人没有航海传统。有一次在罗马开会,我对海尔达尔说:托尔,我想不是印第安人把甘薯带到拉帕努伊,而是拉帕努伊人去南美大陆把甘薯带了回来,当然,可能的情况是,他们也同时带回了印第安人的公主,因为我们玻利尼西亚人生得太俊美了。”

不管甘薯是怎么来到复活节岛的,在欧洲人出现之前,甘薯是复活节岛最重要的农产品。研究者认为,甘薯大约在13—14世纪进入复活节岛,与岛上人口的增长和摩艾规模的扩大先后同时,其间必有关联。在甘薯到来之前,岛上的主要农产品是山药和芋头(和玻利尼西亚其他岛屿一样),可是这两种作物在快速渗水的火山岩地区收获不佳,只有甘薯到来后,复活节岛才进入全盛时期,也才可能支持大规模的石雕作业。正是因此,拉普在剑桥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复活节岛的甘薯文明”的说法。“我知道很多人是不高兴的,”拉普说,“他们觉得南美才是土豆和甘薯文明。可是甘薯对拉帕努伊真是太重要了。”

我们中有人提到传奇般的“鸟人”,想知道这个传统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在玻利尼西亚群岛的其他人群中未曾出现。鸟人是指岛上各民族间的竞争方式。每年海鸟生蛋的时节,各民族选出一个勇士,看谁能够最先泅渡到大岛岛礁上,取出新生的鸟蛋,再完整地送回复活节岛。胜者所代表的氏族获得接下来一年时间的领导权。“当然,鸟人是拉帕努伊人发明的,正如摩艾也不见于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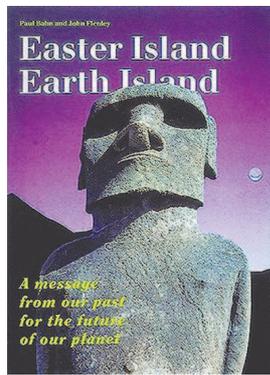
他玻利尼西亚文化,”拉普说,“如果说摩艾代表着祖先崇拜,鸟人替代摩艾说明源自玻利尼西亚传统的祖先崇拜开始崩溃,因为鸟人游戏的实质是靠实力而不是靠血缘秩序来决定权力分配。”欧洲人初到复活节岛时,看到的就是鸟人时期。从摩艾到鸟人,是复活节岛历史的重大转折,决定性的因素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和食物生产的短缺。

这样,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复活节岛古代文明的崩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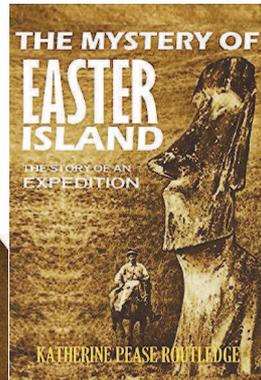
4

拉普解释说,玻利尼西亚人在大洋上长程迁徙时,他们的独木舟里通常带着驯化的动植物,植物主要是芋头和山药,动物是狗、鸡和猪。然而来到复活节岛的先民没有带猪和狗,也许是失落在漫长的迁徙途中了。复活节岛周边缺乏大型珊瑚礁,也就是没有天然渔场,因而近海捕鱼的条件也几乎不存在。很长时期内,岛民唯一的蛋白质来源就是鸡,也许有限的海鸟蛋算得上是一个补充(后来的鸟人竞争很可能就源于岛民到岛礁上猎取鸟蛋的长期经验)。因此,鸡在复活节岛的文化生活中地位独特,白鸡祭祀是祭祀的最高等级。

先民登岛之后开展农业种植,首先要砍树,大量棕榈树在此过程中消失。失去森林的保护,高地土壤随着降水流失,地貌发生巨大改变,可耕地越来越少。即使甘薯的传入曾一度缓解这种地地矛盾,但随着人口增殖,土地产出下降,食物短缺的危机很快转化为社会人



在人类自造生态灾难的叙述中,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1992年出版的《复活节岛,地球岛》



凯瑟琳·劳特利奇与她那部著名的《复活节岛之秘》(1919)(2017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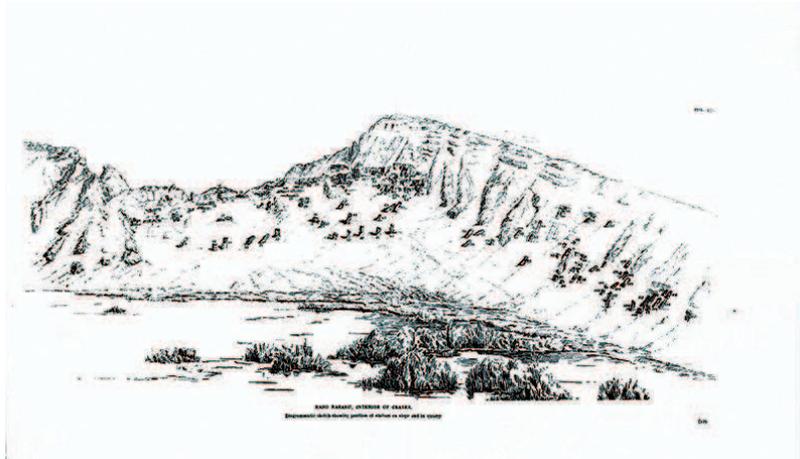


间的竞争和冲突。资源消耗净尽然后迁往他岛的玻利尼西亚模式,复活节岛的岛民无从照搬,于是人们只好在这里挣扎着走向末路。大概从16世纪开始,各类冲突愈演愈烈。研究者从黑曜石制作的武器推测,岛上一度爆发过血腥的部落战争。早期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还根据岛民传说,推测岛上曾经有过人吃人的时期,当然这是未经证实的。拉普和许多研究者一样,认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了复活节岛的社会衰败,而造成生态恶化的,恰恰是岛民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

对今天的公众来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这正是许多人描述的人类与地球的关系。事实上,从达尔文以来,孤绝于世、生态独立的岛屿,常常被研究者当作“微宇

宙”(microcosm),是具备可控条件的历史实验室。复活节岛就提供了一个绝佳个案,被视为观察人地关系的实验室。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生态环境研究日益得到关注以来,复活节岛的历史越来越被看作一部人类破坏生态最终毁灭自己的启示录。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1992年出版的《复活节岛,地球岛》(Easter Island, Earth Island),作者是英国考古学家保罗·巴恩(Paul Bahn)和新西兰古气候和古环境学家约翰·弗棱利(John Flenley)。以此书为榜样,许多研究者和作家都以同样的论述立场,把复活节岛的历史当作当前人类社会的前车之鉴。其中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可能是贾雷德·戴蒙德

(下转9版) →



凯瑟琳·劳特利奇《复活节岛之秘》插图,描绘北部火山口采石场的全景。

凯瑟琳·劳特利奇《复活节岛之秘》插图,描绘她和丈夫在采石场一带发掘和测量摩艾石像的工作场景。